

翻译的变异：世界文学未来何在

曹顺庆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今天,我们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相提并论已经不算新奇了。早在1886年,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就已经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先驱波斯奈特(H. M. Posnett 1855~1927)在《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将“世界文学”加入了比较文学体系,并在书中探讨了“世界文学”起源和异质文明的关系。实际上,比较文学的最早阶段是“世界文学”,而比较文学的最高目标也是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然而,比较文学学科自建立起,便在质疑和危机中前行。目前在西方,部分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研究应当走向“世界文学”研究,并以其作为学科发展新趋势。但是,“世界文学”的含义尚无定论,学者们各抒己见,致使“世界文学”内涵既丰富多样,又有混乱与矛盾之处。本文将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来探讨“世界文学”概念的最新发展状况。

“翻译”的世界文学

1992年,比较文学理论家杜里申(Dionyz Durisin 1929~1997)在斯洛伐克出版了《什么是世界文学?》,这是他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但却是文学史上第一本讨论“世界文学”的专著。书中总结了“世界文学”的三个概念,即学界最为流行的“三名法”:

1. 世界文学是关于全世界的文学,以及作为各国文学史总和的世界文学;2. 作为各国文学最优秀作品集的世界文学,是对于既有文学作品的一种综合概观,即“经典文学”“文学中的经典”;3. 作为各国文学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的或相似的产物的世界文学。

除了提出“总量上的世界文学”和“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这两个概念以外,杜里申还发现了作为“文学间进程的世界文学”。他指出,这种进程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文学本身及其学术发展过程中,“它要经受不断的修正以及内部的重构””。杜里申虽然认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多维性,即难以用静止或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概念,却又回到了对“同”与“异”的二元对立模式中,陷入了“求同”还是“求异”“共性”还是“个性”的漩涡中。

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讨论,最受关注的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者丹穆若什在200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什么是世界文学?》。在这本书的结尾,丹穆若什提出了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三重定义:

1. 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2. 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3. 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中超越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

丹穆若什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解构了以往世界文学观念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改变了以往崇尚经典的世界文学观念。尤其是他将“世界文学”定义为“借助翻译在语际之间传播、折射与阅读的文学”让学界耳目一新。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在此之前强调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真正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文学”,需要跨越语言文化巨大的鸿沟。像过去比较文学研究那样强调从原文去把握“世界文学”,根本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翻译。总之,现阶段国内外学者们的主流观点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超越其本身创作背景,以翻译为主的文字流通形式。“世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了“翻译”的文学。

在学界,“世界文学”被定义为“翻译”的文学已经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丹穆若什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更新,让各个民族的文学因传播、翻译与阅读而鲜活了起来。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近年来,来自不同国家、民族与区域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文学作品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世界文学”本身并不是拯救西方比较文学颓势的一剂清醒剂,而是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诸多问题之后的一种妥协,是为了回避异质的可比性,维护西方话语传统的旧题新论。例如,以上诸多西方学者所说的“翻译”,究竟是翻译成什么语言,是以英语为中心,还是多语言的翻译交流?是否一旦有了比较多的翻译,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文学?是否有翻译和世界性的广泛阅读,就一定世界文学?关键是,被翻译之后,以及被不同文明的读者阅读之时,原来文本的变异问题被学者们忽略了!

笔者认为,“世界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作品;要有不止一种语言的译本;影响力超出本国或本民族,甚至跨越文明圈;不仅受到了其他文明和文学的影响,而且在对外传播中出现了变异现象。正因为这种文学不仅接受了他者的影响,又在传播过程中影响了他者,所以其必定具有可比性,而绝不是优秀民族文学的简单翻译或者并列。只有经过了异质文明检验的“世界文学”,才称得上“宇宙文章”,而能够悦纳文学异质性的读者,才是“世界文学”的合格评判者。英国伦敦大学女王学院教授提哈诺夫也指出,“世界文学”这一思想不该仅限于欧洲和北美。我们应该做的是去接触不同版本的“世界文学”,理解不同的文化区域,从而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不同的格局与动态。那么,当这些版本的“世界文学”问世之后,我们可以从其异质性和特殊性来进行分析。没有多元的标准,就不可能在文本集合和学科的意义出现真正的“世界文学”。也许,只有当非西方学者不再盲目赞同和推崇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的认识,而是从自身的文明和传统出发来重新定义、认识和解读“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才不会成为背靠西方话语体系的学舌鹦鹉。因此,笔者主张以文明的异质性对抗“世界文学”单一化的危机,进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



跨语言变异可以带来什么?一种文学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经过文化过滤、翻译和接受的综合作用可能会经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异,这是一个“文学他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学话语的变更过程。哪一种话语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上风,需要综合平衡。正是由于变异,翻译文学不再囿于本土文学的范围内。唯有让翻译在异质文化内积极融通,本土文学才有可能跨越民族边界,真正走向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从歌德的浪漫主义到马恩的现实主义

杜红艳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虽然不是第一位提出“世界文学”的学者,但他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却是影响最大的。今天,我们在讨论“世界文学”时总是不自觉地从歌德对它的阐释和建构说起。

据统计,在歌德的写作和被记录的谈话中,一共出现了21次“世界文学”这个词。但遗憾的是,歌德没有在任何一处给它下一个清晰的定义,这也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争论“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原因之一。在追溯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时,我们不得不回到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歌德是在欧洲正遭受革命和分裂的历史背景下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产生兴趣的。这一时期欧洲正在经历法国大革命(1789~1794)和拿破仑战争(1803~1815)。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进入了战后恢复阶段。当时欧洲的世界主义意识刚兴盛起来,短暂的和平加速了文学的交流,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强并立之下势头较弱。基于这一历史条件,歌德开始思考如何能够恢复民族的统一并避免战争的分裂。作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匠,歌德自然而然地想要通过文学的战场来推动德意志民族的统一。1827年1月31日,在与门徒艾克曼的谈话中,他第一次公开地阐述了对“世界文学”的构想。他这样说道:

我越来越深信,诗是人类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歌德最早公开谈论“世界文学”的记录。此后直到去世,歌德都在不断地回到这一话题上来阐述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接下来,在1828年的自然科学代表大会上,歌德发表演讲进一步向大家厘清他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

在大胆地提出一个欧洲的、实际上是普遍的“世界文学”概念时,我们不仅仅是说不同的国家应该了解对方以及对方的商品,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久了。商品会自己宣传自己,并且会不断地被投入市场。在这里,我们指的不是这个!事实上我们指的是那些活跃的、努力奋斗的学者们应该学着去了解对方,通过各自的爱好和相似的品味去了解对方,进而找到协同行动的动机。

在这里,歌德也已经发现这个世界(欧洲)之间的商品流通已经无法阻挡,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无处不在。所以从民族情况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增进交流,增进学者们的互通和文学作品

“变异”的世界文学

丹穆若什曾指出,“变异性是世界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成特征之一”。既然世界文学是一种全球性的流通和阅读模式,且一个文学文本

的流通。20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了这个歌德试图回避的“世界文学”概念: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文学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实际上,歌德已经在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中感受到了这个商品化的“文学世界”。但他也已经阐明,他倡导的“世界文学”并非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商品的互通有无,而是在“文学市场”上文学文化的互通有无。陈跃红先生指出,尽管歌德和马恩的理论角度不同,但其共同性注定大于差异性。他认为歌德的论述基本上是从“交往”出发,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希望营造一个各民族在文学方面和谐交往的文学大家庭;而马恩的论述则从“生产”要素出发,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将各民族文学视为整体世界的“公共的财产”。从本质上来说,二者都指的是文学的流通。诚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将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视为商品般的物质实体而将其捏成整体,但这却忽略了各国文化的异质性特征,使得各民族、各国文化丢失其特质。马恩的“一个世界的文学”只意味着无限平面的铺开,意味着普遍性和遍无不及的推展,意味着将各种差异统合为一体。

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里,歌德对“世界文学”的阐释和建构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但是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基于历史条件提出的,是他统一祖国的愿望在文化层面上的显现。因而,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虽然引入了跨东方文明文学比较研究,但他的主要目的是阐释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文学”,是强调“德国人将在其中扮演光荣的角色”。即使歌德本人对欧洲以外的文学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术语主要是为了推动欧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加强交流,以期更好地了解各自的文化,防止战争和分裂。在20世纪末,很多学者都意识到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后来实质上发展成为了“欧洲文学”,甚至只包括主要的欧洲文学。有关“世界文学”概念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的文学现实情况,经历不断的修正和重构。进入到21世纪以来,学者们慢慢回到了歌德最初浪漫的“世界文学”理想中去,开始注意去除欧洲中心主义、去除文学商品化、尝试建立一个文学的乌托邦,实现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大同”。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多数时候都是依赖译本才得以被阅读,那么这个文学文本要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它首先就要经历被翻译,然后才能在原语语境之外的其他地方得到传播。但是,文化和文明间的异质性又使得翻译在很多时候

候需要将原本文本用其他的语言和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转换之后才能具备可操作性。因而,在翻译和接受的过程中,文学文本需要经历多个层面的变异。只有在翻译中发生变异,世界文学才得以形成。变异凸显了语言形式表层下的文化间的异质性,以此丰富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内容,异质性和变异性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在变异学的英文专著《比较文学的变异理论》(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笔者提出变异学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等方面。几个方面共同构筑起变异学的理论体系。在异质文化的传播中,由于传播主体的选择、语言体系的差异、接受主体的过滤等因素影响,文学作品在流传至他国后势必会产生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于此所形成的文本变异现象成为了变异学理论的前提与基础。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从研究范围来看,变异学理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首先是跨国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关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其次是跨语言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译介学。文学作品在流传至他国时将穿过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在目的语环境中被接受,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变异是变异学所关注的焦点。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典型代表是文学接受学研究。第四是文化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过滤。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论是文明对话与话语变异问题。

这五个层面的变异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其中跨语言变异是贯穿其他四个层面变异的一条红线。它们的可比性依据源于语言、文化乃至不同文明的基性话语规则的异质性。

以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为例,他的成功再次证明,用非英语写成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可以经由翻译跻身于世界文学的经典之列。当然,莫言的作品首先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品,但正是依赖翻译,它们才获得全世界的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可,诚如莫言自己所言——“翻译家功德无量”。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作为一个“值得托付”的译者,他明显更懂得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拒绝什么。为了适应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环境,“葛浩文对莫言的小说也确实有所删改,也许有批评者认为作为翻译者的葛浩文不够‘忠实’,但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英美当代文学的外衣,这恐怕是葛浩文译本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国内的译者很难与之比肩的巨大优势”。显然,在跨越边界的文学翻译活动过程中,变异成就了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接受,使他的作品成功跻身世界文学行列。

没有翻译的变异就没有世界文学的形成

在当前的东西方学界,“世界文学”被定义为流通中的翻译文学已广受认同。可以这么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我们可以往前更进一步——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发生了变异的文学,没有翻译的变异,就不会有世界文学的形成。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转换的过程,变异在其中如影随形。由于文化间的异质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的存在,原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对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文是不可译的。一个文本可以生发出多种意义阐释,任何一个合乎情理的阐释理得到充分的尊重。此外,翻译的过程是两个文化传统对话的过程,当两种语言之间发生转换的时候,译者扮演了跨越文化和语言两种边界交流的中间人。当然,思想或信息在交流中难免会有增减或者扭曲变形,这是翻译的难处,也是不得已的地方。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曾说过“诗歌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因此,翻译的变异对世界文学形成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跨语言变异可以带来什么?一种文学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经过文化过滤、翻译和接受的综合作用可能会经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异,这是一个“文学他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学话语的变更过程。哪一种话语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上风,需要综合平衡。正是由于变异,翻译文学不再囿于本土文学的范围内。唯有让翻译在异质文化内积极融通,本土文学才有可能跨越民族边界,真正走向世界文学。

在这里,我强调翻译的变异及其对世界文学形成的重要意义,目的是为了说明变异在翻译中的不可避免性,同时变异也正是文学在通向世界文学的途中所收获的东西。简而言之,我们要看到翻译在世界文学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变异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没有翻译的变异,国别文学将很难步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只有在翻译中经过了变换与调适,本土文学才能被外来文学所接受和吸收。今天世界文学的概念本质上已经暗含不同文学的交流、对话和互补特征,文学的他国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变异,它虽然不会经常发生,但却是一种理想的文学间相互吸收、融合和促进的过程;它可以为本土文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充实本土文学的经典宝库。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学术速递

齐柏平(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

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和转折点。学堂乐歌吸纳了西方的音乐文化,加速了中国音乐语言的国际化发展。学堂乐歌不仅在音乐上让人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对教育领域的知识之承递、思想之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从人格培养和社会风气的改造方面也显示出其强大活力。对学堂乐歌的研究,不仅有助于音乐本身的解读,而且有助于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考察。

——《“学堂乐歌”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中国早期文本,存在“诗性叙事”与“实录原则”两种书写思维模式,这促成了“史诗”与“史实”两种文本的产生。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本的书写,大多没有超越这两种思维模式。先秦《诗经》《尚书》对此有直接体现,至司马迁《史记》逐渐统一并明确。书写者身份与生活地域的差异、书写时代的变化,都会造成文本文学的差异。这会促成中国早期文本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又使得早期文本也有文化、思维、制度等方面的“确定性”。

——《从“史诗”到“史实”——试论中国早期文本的两种书写思维及其演进》,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董滨宇(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苏珊·沃尔夫认为,康德的伦理学以严格主义的形式,支持建立一种“道德圣贤”概念,它是不完善的行动者所应该达到的完善状态。然而,沃尔夫却指出,这一论调在理论上是偏激的,而在实践中,对于一般人而言又是不现实的。站在一种直觉主义立场上,沃尔夫反对以康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为代表的伦理学将普遍规则作为行为的主要衡量标准。对此,本文指出,康德的伦理学并未建立一种“道德圣贤”理论,也未要求人们成为“圣贤”;恰恰相反,康德极其反对这种“完善主义”论调。康德的义务论提供的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描述,而他此后所提出的“德性论”又是对其义务论的延伸与补充。尤其是在其“德性论”中,康德以“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之分,表明了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属于“完全义务”,而“不完全义务”是指人们除此之外,可以根据自身品格与情况需要而有选择性地遵守的义务。后者而言,违背它并不必然是受到谴责的,而履行它则是值得被赞扬的。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康德认为人们才会追求所谓的“道德完善”。总之,康德的伦理学中既包含了“道德圣贤”的理念,又未将其作为一个必要的道德标准。更多时候,他是在一种否定性意义上使用它的。

——《论康德反对“道德圣贤”——从“绝对命令”到“道德完善”》,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席书旗(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玉梅(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外向征服”的实践方式、“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导致了现代生命科学发展的伦理困境,而我国道家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道生德养”的哲学思想为纠正西方生命科学伦理困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思维方式和核心价值观和实践方式,“轻物重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克服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过度泛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处事态度有利于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人与自然的伦理安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思想揭示了生命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手段。从道家文化视角出发,建构现代生命科学伦理观应该确立“以道取技,道技合一”的生命科技伦理精神,“道法自然,慎慎先行”的生命科技伦理实践原则,“贵生顺天,视死若归”超然的科技伦理生死观。

——《道家文化视角下现代生命科技伦理观的构建路径——以老庄思想为切入点》,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王健(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阳(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对自然生殖过程进行人工干预为一些不育症患者带来了生育的希望,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伦理特别是基督教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有悖于生命神圣性原则、影响婚姻关系、割裂性与生殖的必然联系三个方面。发挥基督教伦理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动态规约作用,使辅助生殖技术有可能符合“生命本原之真”“婚姻幸福之美”“道德生活之善”的人类生殖本性,同时有助于基督教伦理自身的世俗性转化,弥合辅助生殖技术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

——《辅助生殖技术的基督教伦理规约》,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6)

栏目主持:韩天琪